

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

□ 林聚任 刘翠霞（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Abstract :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Shandong according to views of social ethos, sophisticated tactics, senses of trust and safety, social involvement and relational net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 good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Finally, the authors try to revise some conventional ideas and hope to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一）社会风气观

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风气都会有一个总体的评价，或好或坏，相应地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就往往会呈现出两种倾向：乐观或悲观。通过调查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公共道德秩序、人际关系、信任度、干群关系、家庭关系、集体责任感、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等方面的看法，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隐忧情绪，对社会精神文明生活所持的悲观焦虑倾向大于乐观倾向。根据相应的百分比计算得出：悲观倾向度为0.450，而乐观倾向度为0.349。在调查中，笔者曾经针对这一问题临时询问了许多调查对象为什么感觉公共道德秩序下降，被调查者几乎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怀旧”情结。“咱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这人心哪，跟以前没法比。”“以前都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有多少人黑天半夜的就到生产队去偷偷干活，第二天早上经常会发现一大片的麦地已经收割完，成捆成捆地扎在那了。”“叫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就是傻里吧唧的。”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成员尽管生活清苦，却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可以说除了生产力落后，那就是中国农民心中所向往的大同社会。这种大同社会的弊端在“文革”十年间开始暴露出来，但在普通社会成员还未来得及完全意识到和抛弃那些社会弊端、摒除文革的消极后果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前后对比，社会成员难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而且，不同的城乡发展战略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城乡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陷入无尽的困惑与焦虑中。如果把社会焦虑指数看作是悲观倾向值与乐观倾向值的商，那么当前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社会焦虑指数为1.289，是比较高的。社会焦虑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的发展、秩序的安定带来隐患。这无疑应当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尽管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焦虑，调查中却发现有两点例外：一是被调查者认为人们对集体公共事情的关心程度“提高了”的比例高于“下降了”的比例，分别为46.9%和39.1%。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农村居民随着现代发达的交通传媒技术的影响，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视野也逐渐开阔。但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是一种“逆关心”，因为乡镇和村集体总是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摊派乱收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不得不关心集体事务，其极端形式就可能是上访。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坦言“不关心不行啊，要不就没法好好过日子了”。二是认为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和睦融洽了”的比例远远高于“矛盾冲突多了”的比例，分别为49.3%和13.6%。不可否认，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的宣传，现代中国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日益向平等化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转型时期，面对激烈残酷的社会竞争，家庭作为避风港湾所发挥的精神慰藉功能，无疑使家庭关系变得更为情感化。而对于年轻的父母子女来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子女数量减少，更容易加深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沟通，故而家庭关系更为和睦融洽。这些作为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公共参与

根据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观点，农民由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限制，天生带有狭隘性，自主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参与率低，农村社团性组织较少，即使有也相当不规范。在调查中我们的确找到了与这些观点相符的数据，当问及“您所在的单位是否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时，只有16.8%的被调查者回答“经常”，“偶尔”组织的也仅占40.9%，而回答“从不”组织的竟高达32.1%。相应地，当问及“您是否经常参加本单位所组织的活动”时，接近3/4的人“从不参加”或只是“偶尔参加”。而76.4%的被调查者对当地所谓的民间组织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参加了。但是还未来得及庆贺调查数据与已有理论观点的契合，将两个问题联系到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单位或社区很少组织集体活动，农村居民怎么可能会有高的集体活动参与率呢？而且，调查中进一步发现，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其实是很高的，在问及“您对当地公共事务的态度”时，有81.6%的被调查者回答“积极参与，认为应由当地人共同协商决定”或者“想参与，但缺乏参与的正当渠道和条件”。可以说，农村居民在很大意义上是“被迫性不参与”，而非真正的不想参与。在笔者负责的调查中，这一问题引出许多被调查者的话匣子，由于当时调查的村里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许多村民正谋划着上访。其中一位在村里颇有些威望的大爷说，“村里要做啥大事情，当然得跟所有社员知会一声，我们大伙举手表决才行，可村里干啥事都不说，社员们还蒙在鼓里，咱北山那一大片地就全给卖了，这怎么成？……可话又说回来，咱要去上访吧，就得多召集些人，可咱村胆小怕事得多，真正要去恐怕没几人。”笔者顺便问及“村领导不是村里人共同选举出来的吗？”“什么选举，形式而已，镇领导早就拟好人选了。”其中就透露出被调查者参与集体事务的许多愤慨和无奈，而所谓的选举就只能成为“被迫应付性参与”了。从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端倪，被调查者的参选率是很高，但参与地方决策、提建议的比例远远小于其它参与比例。通过相应计算得出，被调查者的公共参与度为0.355，其实这很可能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只能反映参与行动，而反映不出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仅凭一些表面数据和行为，我们并不能说被调查者的社会参与意识低。可以说，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是农村有待挖掘的潜在社会资本，一旦其力量发挥出来，必定会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而这关键是要社会与政府的有效引导，并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正关心其利益。

当然，说他们的参与意识较强，并不是说所有农民的参与意识都一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的参与意识与其文化程度有着显著的相关。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社会参与意识越强烈，由此教育的作用可见一斑。应该说，文化程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载体，对社会资本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加强农村社会的教育力度，完善农村教育设施，对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处世之道

社会资本最终都要体现于人们的处世交往态度和行为中。可以说，处世之道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连接的结果，既反映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积淀，也折射出当时当地人们的利益、情感需求和取向，是一种处于中介环节的社会资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传统倾向度为0.481，而现代倾向度为0.473，二者相差微小，可见至少就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农民就是传统的。尽管他们还不能完全称得上是现代农民，但至少可称为新型农民，既不因循守旧，也不会引领潮流，这也正符合中国农民的“中庸”特性。比如，在调查中发现，半数稍强（55.7%）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人处事的首要原则”是情义和信赖，而41.5%的则选择了利益和原则；对于“找人办事请客送礼是否正常”的回答，也是基本持平的，分别为49.9%和45.7%。中国农民永远不会是最落后的，也不会是最先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和“缓冲带”。这一点应是学界慎重考虑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社会稳

定机能究竟在当前中国能发挥到何种程度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致同意中国是关系伦理本位的国家，在处世之道上注重人伦，但这种观点是在与国外的横向比较上得出的，而不是在中国内部的纵向比较上得出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对关系的态度，中国是较为重视关系的功用的。调查中同意“要办事，靠关系”的人占67.3%，证实了中国人对关系的注重。但就中国内部而言，关系的功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居于首位的是个人能力。在对山东省农村的调查中，发现56.1%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决定能否找到合适工作的最主要因素，而选择“有无关系”和“家庭条件”的总计才占37.3%。另外，被调查者中有86.4%的人同意“亲兄弟，明算账”，可见关系和利益是区分清楚的，不会被混为一谈。所以当我们再次提及“中国是关系本位的国家”时应当考虑其参照点。对比纵然能厘清自己，却也会误入他者的陷阱，对于农村的看法，我们的学者也常常在与城市的对比中“失真”。当然，重新审视“对比”，这并未能解决全部问题，处世之道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随世事而动。农村当前所处的特殊环境，必然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观矛盾冲突不断，作为一种生活需要，处世之道中包杂着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是难免的，这便是农民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无奈的圆滑”。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69.7%的被调查者更喜欢独立做事或经营。中国是家天下的国家，向来带有家族主义倾向。为什么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喜欢独立经营呢？当询问喜欢独立做事的被调查者原因时，他们大都说：“合伙经营一般干不长久，相互猜来猜去，明明关系很好的两家人很可能最后不欢而散，还是自己干得劲。”看来，其中既有理智，也有无奈，而怕伤和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喜欢独立做事并不一定表明不重感情，相反可能是因为害怕太重感情而误事或合伙经营伤感情。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存在着的信任危机：“不怕外人骗，就怕熟人欺”。尽管喜欢独立做事经营的占多数，但当被问及“在工作或生意方面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遇到问题时的求助首选对象”时，还是分别有79.1%和72.1%的人选择了“本家人”和“亲戚”。这明显表现出一种千百年来积淀的家族主义情感。有学者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归结为“无机群体意识”，是比较贴切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又会看到，被调查者对“本家人”和“亲戚”的依赖性，是与他们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的。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职业以务农为主，这也决定了他们与业缘关系的同学、同事等的交往是有限的，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越高，对“业缘关系”的依赖性越强。

在处理养老问题上，被调查者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尽管“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人仍占到了61.1%，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年龄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年龄越大，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小，则倾向于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自己或政府组织。这暗示出在未来社会，养老将走出家庭，迈向社会。这也说明当前中国的“孝文化”已经发生了嬗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日渐退出生活舞台。尽管现今在生育问题上仍留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但人们已经不太重视生男孩与养老之间的关系了。有被调查者说：“男孩女孩其实都一样，不过生男孩不会断了祖上的根，好像活着奔头劲儿也大。”“是不是也因为男孩将来可以为自己养老？”笔者顺便问。“养老？不太指望他们下一代养老了，再说了，将来我老了，但凡能动，也不会去麻烦儿女，实在动不了，才会让他们照料照料，到时说不定女儿更贴心，比媳妇好。”所谓的生男孩已然成为沉淀进中国人思想中的集体无意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另外在夫妻关系上，农村居民的认识也出乎预料：有47.6%的人不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而赞同的占47.4%，基本上持平；认为家庭中的重大事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的占67.5%。总体上说来，夫妻关系是向着平等方向发展的，反映了社会性别意识的增强，而这也是衡量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现象是对我们“想象中的农村”的极大反驳。夫妻关系的平等化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能够扩展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可见，农村居民的处世之道已经完全不同以往，相应地，其社会资本也不能以传统或现代简而概之。也即是说，农村居民的现实生活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融合的趋势，在情感义务和利益理性之间随势摇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他们也在不断调整着自身的行为观念，以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

（四）信任安全感

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纽带，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本体安全感和幸福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转的保障，也是社会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底线。当然，我们这里所言及的信任更多的是指涉人际信任，而非系统/制度信任。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低信任度国家，是一种特殊性的信任，对家族以外的人信任度极低。通过调查，我们的确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对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对与自身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信任度较低，血缘成为是否信任的第一判断标准，其次的是否熟悉。总之，信任是建立在看得见的基础之上的。从下列表六中还可以看到，社会成员对领导的信任度仅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这反映出农村政治生活中干群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为什么农村工作难以开展？当地有位敢于直言的中学教师说，“领导没有威信，不体察民情，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琢磨着怎么往上爬，哪管咱老百姓的死活，自己什么都不懂，没什么能力，就知道瞎指挥别人。现在的村民也不是以前了，谁摆他个谱儿？”个中原因，一语道破。

另外，主成分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可以将对九种关系的信任度提取为两个公因子：家庭成员、亲戚、同学在F2上的因子负载高，可称为“情感因子”，反映的是特殊信任。而领导、一般朋友、生意伙伴、不熟悉的人在F1上的因子负载高，可称为“功利因子”，反映的是普遍信任。而同事和邻居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载量相差无几，会因时因势变动，既可以反映特殊信任也可以反映普遍信任。其中可见，亲密的共同生活对于信任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家庭成员、亲戚还是同学都有着亲密交往的场域，因而信任度较高。

这足以证明，农村居民信任的基本格局还是差序性的，但这并不表明单纯的血缘关系会直接导致信任，频繁的交往和共同的生活产生的情感才能促成高信任度。因为在调查中，80.4%的被调查者与亲属的交往更多地是出于“情感”，出于“义务”的仅占11%，也就是说，假如与亲属没有相互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亲密情感，信任也不会产生。

比如，调查中，当问及“目前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吗”时，回答“是”的比例占到51.5%。这表明，山东农村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度是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其生存的社会所持的一种基本信念，既然大多数人都是可信任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充满希望的。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福山所谓的高信任度或低信任度国家的说法。其实，早就有数据表明中国并非像福山所说的是“低信任度国家”。1990年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 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调查中，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名第四；1996年新一轮世界价值调查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结果有50%的中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信任度仍是相对较高的。而到1998年，美国、香港、大陆三地学者在中国四个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圳）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其中深圳的社会信任度仅为16.8%。这似乎表明，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度正在下降，而不是本来就低。当然1998年的调查涉及的四个城市基本上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其代表性是有问题的。如果1998年的数据能够推广到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而我们调查的数据足以代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城市呢？或者说，在中国，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信任度越低？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但由于对信任的理解分类不同，实际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一般说来，正是由于中国系统/制度信任度低，才导致人际信任度相对

较高，这从上述农村居民对于领导的信任平均分仅为 5.21 可以部分反映出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也同样发现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行政职务等后天性因素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相关，而与年龄、性别等先天属性基本无关，也就是说高学历、党员、干部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可见社会信任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心理学所强调的单纯的人格内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信任度的形成。

此外，在调查中也发现，被调查者中遇到过上当受骗情况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占 58.9%，曾被熟人坑骗过的占 36.5%。还有 69.7% 的人更喜欢独立做事或经营。这些无一不是中国信任危机的表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杀熟”现象，这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界讨论颇多的一个话题，此次调查中得出的杀熟比例是较高的。而就听到的被调查者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买东西最好别买熟人的，不好意思砍价。”因为当地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集贸市场，每五天赶一次集，乡里乡亲“打照面”的机会多，其中买卖关系自然也产生了。由于相互熟识，地点人员相对固定，较易形成长久的买卖关系，其中坑蒙拐骗行为相对较少。据乡亲们介绍经验，一般不会去特别熟悉的亲戚朋友那里买东西，尤其不会去买“半生不熟”的熟人的东西，其中有尴尬心理，也有戒备心理。以往的研究似乎仅仅注意到“代理人角色”对“委托人角色”的杀熟，也就是被信任者利用施与信任者对其的信任损害施与信任者的利益的行为，不妨称之为“恶意杀熟”。当然我们这里的统计也是基于此意义上的，但通过一些简短的谈话、村民的独立经营偏好以及对集市交易场景的观察。笔者发现，也存在着另一种“委托人角色”对“代理人角色”的杀熟，也就是使自身行为与人际信任无涉，避免“被宰、被出卖”的风险，也避免被人误会“宰人、出卖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杀熟”。这两种杀熟很有些类似于“内举不避亲”和“大义灭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杀熟在当前环境下成本代价小，并不足以威胁到杀熟者。对前一种杀熟行为而言，由于生活空间扩展，流动性高，完全可以在杀熟后实现居住地的空间转移；对后一种杀熟行为而言，既可以规避前一种杀熟风险，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伤和气。这两种杀熟都有一定的滋生土壤，并非普遍化的现象，可以说是藏于风平浪静的差序信任格局之下的潜流。

总之，尽管大部分农村居民都有上当受骗的经历，被熟人坑骗过的也占三分之一强，但其总体社会信任度还是相对较高的。而且，目前的人际信任基本上还是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其中杀熟现象日益显露，另外制度信任可能较低。这就部分推翻了我们原来的假设。

（五）关系网络

格兰诺维特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交往是否频繁等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后来的许多学者也都乐意运用这种关系两分法，解释一些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每个社会都有强关系和弱关系，其社会成员一般对于强关系的重视都会大于弱关系，因而，这样的关系两分法只注重了关系的横向静态性，而且分析范围也仅局限于微观层面。要用之解释较为宏观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态，似乎略显片面。因而这里，为了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的更为形象全面的特征，我们将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交往倾向的不同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在理想状态下，内向型关系网络注重情感、内心体验、稳定性，反映的是一种封闭性心态，而外向型关系网络则注重理性、功利、流动性，反映的是一种开放性心态。当然，两种类型总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通过调查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是趋于内向型的，由统计分析得出其封闭度为 0.579，而开放度为 0.380。这明显是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山东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乡，人们之间的交往仍以儒家倡导的“礼”、“情”为核心，重脸面，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格氛围，进而使社会关系网呈现出内向性。调查中有一系列具体数据可以反映这种封闭形态：80.4% 的被调查者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是出于情感，58.9% 的被调查者平时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戚邻居，81.6% 的人认为“人品好、性格相投”是最重要的交友条件，85.2% 的人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避免关系

“内卷化”、“家族化”带来的诸多不利，山东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的外向性也逐渐凸显出来：60.7%的被调查者现在的交往圈子比前些年扩大了，与常有往来的亲朋好友的空间距离延伸了，而且46.1%的人认为对自己工作生活帮助最大的关系网是开放性的朋友熟人网络，与选择血亲网络的比例基本相同。此外，40.1%的人平时的请客吃饭带有了很强的功利色彩，主要为了求助或感谢。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56.9%的人主要通过正式组织、传媒等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生产、工作、生活信息，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信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的需要，这应该可以作为农村现代性的又一个佐证。

这里，文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倾向性也有显著性影响。比如：

可见，文化程度越高，对血亲性的关系网络的依赖性就越小，而对业缘性关系网络的利用率较高，其关系网络更偏向于外向，教育对于塑造现代性的作用不可小觑。

（《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林聚任, 刘翠霞, 《开放时代》, 2005年 第4期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